

中国朝鲜族历史

研究 论丛

II

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

中国朝鲜族历史研究论丛

Ⅱ

韩俊光 金元石 主编

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

1992·牡丹江

(黑)新登字第3号

责任编辑:姜贤模

责任校对:宋纪文

封面设计:蒋文峰

封面摄影:南龙海

中国朝鲜族历史研究论丛 II

ZHONGGUO CHAOXIANZU LISHI YANJIU LUNCONG II

中国朝鲜族历史学会 编

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牡丹江市新立二道街35号)

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激光照排室排版

牡丹江书刊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6.25 字数/15万

版次/1992年12月第1版 1992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 1000册

ISBN 7-5389-0477-8/K·14 定价:18.00元

前 言

《中国朝鲜族历史研究论丛》是由中国朝鲜民族史学会主办的、专门研究中国朝鲜族历史的不定期的学术性刊物。它的主要任务是广泛团结国内外历史研究工作者和爱好者，调动史学界学术研究的积极性，及时发表中国朝鲜族历史研究的新成果、新资料，提倡并促进史学领域的交流和争鸣或商榷，努力提高这门学科的学术水平。

本刊第二辑主要收录有关中国朝鲜族历史的论文，同时还收录少量的资料性文章和有关中朝关系史以及史学研究理论等方面的论文。

近年来在中国朝鲜族历史研究这一领域，国内外的研究工作发展较快，不少人在研究中提出了新问题、发表了新见解、引用了新资料，也有对中国朝鲜族历史研究上的某些观点提出了不同意见，进行商榷或争论。凡此种种，需要我们史学工作者及时了解，开阔视野，进一步深入研究、探讨，以活跃学术空气，促进这门科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发展。

中国朝鲜族的历史，不但在中国历史而且在世界历史之林中占据着显赫位置。但我们研究得还不够，探讨得还不深，若想把中国朝鲜族的历史研究好，仍然是我们史学工作者的一项艰巨的任务。有鉴于此，我们定将竭尽全力，鼓足干劲，提高效率，力争缩短刊期，做好刊物的编辑出版工作。

当前，中国朝鲜族历史研究工作面临着新的形势。我们要以改革的精神，广泛与国内外史学界取得联系，注入历史研究工作以新的活力，为繁荣社会主义史学工作贡献力量。

编 者

1992年6月

目 录

朝鲜义勇队、朝鲜义勇军的建立及其历史作用	文正一(1)
梧桐星火——回忆梧桐河朝鲜族革命斗争历史	李 敏(12)
洪范图将军在垦岛	韩俊光(25)
解放战争时期朝鲜人民对我国的支持	姚 光(53)
朝鲜族人民在东北解放战争中的贡献	金宇钟 李炳哲(58)
锐意探索 求实存真——《解放战争时期的东 满根据地》评介	孟繁德(74)
浅谈民主革命时期党在东北地区民族政策的基 本思想	金城镇(79)
试论满洲省委实行的民族政策与国际主义原则	徐学新(89)
客体历史的本质与特点	金 生(104)
论朝鲜族在东北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及其历史地位	王 霖(125)
间岛国民会(提要)	玄 松(132)
论东满根据地在东北解放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	金哲洙(137)
试谈渤海王国的灭亡	方学凤(146)
论三十年代初期东满的苏维埃运动	鲁德山(155)
孙中山与朝鲜独立运动	曹文奇(169)
三十年代初期东满反帝反封建斗争	李圣德(184)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马列主义在延边的传播特点	李凤熙(201)
长白抗日游击根据地概述	金昌国(210)
中国朝鲜族迁入史述论	金元石(227)
朝鲜青年参加广州起义初析	金昌浩(247)
解放战争时期黑龙江省剿匪斗争中的朝鲜族	徐明勋(256)
国民党营垒中的朝鲜族爱国将领金子烈	金璋生口述 田荣整理(274)
琿春海关沿革概述	李昌元 朴相周(281)

解放战争期间的延边朝鲜族人民·····	姚作起(294)
朝鲜共产党及其满洲总局的始末·····	白哲(310)
二十年代之东北“三府”析·····	苏文(329)
试论朝鲜义勇队的建立与发展·····	朴京才(343)
论近代朝鲜族文豪金泽荣的美学思想·····	金东勋(354)
略述解放战争时期的延边工人运动·····	崔成哲 梅林(366)
浅析琿春事件·····	朴美玉(374)
龙井“三·一三”反日运动的经过及其历史意义·····	玄松(385)
三十年代东满抗日游击根据地问题的探讨·····	李云(396)
华北朝鲜独立同盟和朝鲜义勇军的性质及其历史作用·····	李熙(410)
宏观历史研究及其方法浅析——对学术界关于宏观历史研究几个观点的质疑·····	金光 孙厚生(418)
论日本帝国主义的“皇民化”政策和朝鲜族人民反对“皇民化”的斗争·····	韩俊光(435)
论万宝山事件在延边的反响·····	芦速(453)
中国朝鲜民族史学会梁瑞凤将军学术研讨会纪要·····	中国朝鲜民族史研究所(461)
朝鲜古代诗人崔致远在中国·····	何鸢(474)

朝鲜义勇队、朝鲜义勇军的 建立及其历史作用

文正一

在抗日战争中，朝鲜人民为了祖国的光复和独立，参加了中国反抗侵略者，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成千上万英勇的朝鲜儿女战斗在中国大地上，他们血染神州，同中国人民一起浇灌了中朝战斗友谊之花，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朝鲜义勇军是由朝鲜人组成的革命队伍，它在抗日统一战线指导下，带领大批爱国的朝鲜人同中国军民并肩战斗，转战 13 个省区。在中国抗日战争中，不畏强暴，前仆后继，留下了不朽的业绩。我作为一名朝鲜义勇军的老战士，一名一生在中国从事革命工作的朝鲜族老干部，有责任将有关朝鲜义勇军的活动情况记述下来，以奠捐躯在中国土地上的朝鲜战友，以照中朝人民之间的兄弟之情。

1894 年朝鲜李王朝政府，为了镇压东学党起义军，向清、日两国政府请求援兵。日本趁机插足朝鲜并阴谋吞噬朝鲜。1905 年，日帝用武力胁迫朝鲜签订“乙巳条约”，在朝鲜设置了日本统监府，操纵了李王朝的朝政。1907 年，胁迫朝鲜签订“韩日新协约”，在朝鲜各行政部门安插日人“次官”，借以攫取李王朝政权。这年 8 月 1 日，日帝用武力强迫解散朝鲜国防军。继而于 1910 年 8 月 22 日，利用李完用等卖国奸臣，强行“合邦”，从此，使朝鲜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具有民族气节的反日志士，展开了民族独立运动。由于日帝的残酷镇压，义兵将领和爱国志士不得不向国外转移，其中大多数人来到中国，有一部分在东北各地组建反日团体和武装队伍，创办军事学

校，在朝鲜人中点燃了反日烈火。1919年在苏联革命的影响下，朝鲜爆发了反对日本侵略者，争取独立的“三·一”运动，汉城、平壤等地的人民纷纷举行集会，宣布朝鲜独立，反对日本侵略。朝鲜独立运动在东北也有反日团体，人数达2000多人。1920年6月和10月，分别在汪清、和龙取得了著名的凤梧洞和青山里伏击大捷，指挥者便是朝鲜独立军将领。日帝慑于日益壮大的朝鲜独立军的威力，勾结东北的军阀，镇压朝鲜的反日运动。这样一来，好多的朝鲜独立运动者不得不转移到关内地区或苏联等地。还有一些人早在20世纪初从朝鲜直接进入关内，这些来自朝鲜和东北的独立运动者们，聚集在上海、广州、北京、武汉等地，成立各种反日团体和武装队伍，配合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转战关内6个战区、13个省，为我国抗战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我的小学和中学时代就是在这种战斗的革命年代度过的，革命思想的熏陶和爱国主义的教育，强烈地鼓舞着我。我从少年时代就积极投身于反日宣传和解放祖国的鼓动工作，立志为朝鲜人民的解放与独立，为中朝两国人民战胜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而战斗。为此，在“九·一八”事变后，当时东北的朝鲜人民反日独立运动分为三部分力量：一部分留在东北地区继续斗争；一小部分去苏联一面学习，一面开展工作；又一部分进关到上海、广州，后又转移到南京等地。我于30年代初来到南京，毅然走上了职业革命者的道路。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占领上海，在虹口公园举行“祝捷”大会时，朝鲜爱国青年尹奉吉用炸弹炸死了日本的海军大将白川。日军随即对上海的朝鲜革命者进行大规模的搜捕和报复性镇压，使上海的朝鲜革命团体遭到严重破坏。因此，各个组织大都转移到了南京。当时汇集在南京的朝鲜人大致可分两部分：一部分是以光复祖国为目标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如“韩国独立党”；一部分是爱国的进步群众。当时在南京影响较大的朝鲜人组织是“朝鲜民族革命党”，这个组织在沪、宁一带有着一定的群众基础，已吸引了一大批有志的朝鲜青年。它是国民党政府允许公开活动的一个反帝团体，具有小资产阶级的激进性。虽然在号召朝鲜人进行反日斗争，争取民族独

立等方面起着一定的作用,但由于它在国民党的支配和控制之下,因而局限性也较大。鉴于这种情况,长期受到中国共产党影响的朝鲜革命者,于1932年在朝鲜民族革命党内部和韩国独立党内部秘密组织了一个新的革命团体——“十月会”。这是一个马列主义革命理论的研究团体,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我于1934年在南京正式加入了“十月会”。

1936年,曾在共产国际做朝鲜工作的韩斌等老同志来到了南京,“十月会”借此也进行了改组,改名为“朝鲜共产主义青年前卫同盟”(简称同盟),与中共党组织继续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由于“同盟”是关内朝鲜人团体中最进步的组织,是以传播马列主义和革命进步理论为自己的中心任务,因而它不能在国民党的统治下公开活动。为了结成更为广泛的统一战线,争取团结更多的力量。中共党组织规定凡“同盟”的盟员在保持秘密身份的同时,仍以朝鲜民族革命党的名义开展工作。

“同盟”成立后的主要工作是扩大发展组织和在老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加强对马列主义、革命理论的学习。在“七·七”事变前,组织的发展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不仅在上海、广州、北平等地发展了盟员,还派人去东北进行联络,开展了工作。

“七·七”事变后,日益艰巨的武装斗争任务摆到了中朝两国人民的面前。在这种形势下,“同盟”选派了部分年轻的盟员,其中有中共党员李维民等同志,以朝鲜民族革命党的名义,进入国民党中央军校“特别班”第六期专科学习,接受军事训练。“特别班”开始时设在江西省墨子县,后来迁到了湖北省江陵县。参加受训的朝鲜人编为一个区队,共200多人。队长和主要教官都由朝鲜人担任。我是1937年秋末入学,1938年6月毕业的,毕业后我们全体集中到了汉口。早在1937年10月我们进“特别班”的初期,为了促进各朝鲜人团体的联合抗日,由朝鲜民族革命党和朝鲜民族解放同盟、朝鲜青年前卫同盟、朝鲜革命者联盟等四个组织,联合组成了朝鲜民族战线联盟(简称联盟),这是关内朝鲜人的抗日统一战线组织。我们毕业后,“同盟”正式公开,脱离了“朝鲜民族革命党”。1938年下半年,武汉的形

势越来越紧张了，7月4日，我们在汉口成立了朝鲜青年战时服务团，在团长金学武的率领下，与“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一起开展了保卫大武汉的抗日宣传工作。我们用演剧、歌咏、漫画、壁报、讲演等多种形式，深入基层进行宣传抗日救亡的工作。我们还参加了许多救护和慰问抗日官兵的工作。朝鲜青年战时服务团是拥有武装的半军事化组织，为日后“朝鲜义勇队”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1938年10月，武汉处在危险时刻。“同盟”的同志们群情激昂，坚决主张北上抗日。要求去延安，去敌后根据地，去抗战前线。周恩来同志了解到我们的思想和要求后，马上指示我们不要分散力量，要看到其他朝鲜人团体的进步性，要加强联合。并且指出：“政治倾向虽然不同，但都有抗日要求的四个组织要在‘联盟’的旗帜下，组成一支国际反法西斯的半武装队伍——朝鲜义勇队。”周恩来同志还指出：“一些年老体弱的同志和妇女可以去延安，年轻人要留在蒋管区从事抗战工作。”当时已有不少年轻人去了延安，周恩来同志知道后，立即派人把他们找了回来。他精辟地对我们讲：现在是国共合作，在蒋管区工作也是抗日。而且对国际反法西斯宣传上意义更重要，尽管参加抗日的人有着各自不同的政治理想，但可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以造成一个宏大的国际联合，党派联合的反法西斯局面，这是当前的首要任务。为了最终战胜日本侵略者，不能分蒋管区，抗日根据地；不能分前方、后方，党要求我们留在蒋管区进行抗日工作，以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中国共产党和周恩来同志的引导和倡导下，1938年10月10日，经国民党政府批准，朝鲜义勇队在汉口正式宣告成立。在举行成立大会时，周恩来、郭沫若等同志前来祝贺。周恩来同志还在大会上发表了题为“东方被压迫民族与解放斗争”的讲话，强调了国际联合与统一战线作为东方被压迫民族的基本战略方针，在谋求独立解放的事业中的重要性。郭沫若同志讲了中朝历史上联合抗敌的情况。

朝鲜义勇队在其《创立宣言》中阐明自己的宗旨是：要唤起不愿做殖民地奴隶的千百万朝鲜同胞，在朝鲜义勇队这面旗帜下集合起来，要联合在法西斯军阀压迫下的一切民众，打倒我们的真正敌人——日本法西斯军阀，以完成东亚真正永久的和平。朝鲜义勇队还提

出了三大口号：一、动员所有在华朝鲜人革命力量，参加中国抗战；二、争取日本广大军人弃暗投明，发动东方各弱小民族，共同打倒日本军阀；三、推动朝鲜革命运动，争取朝鲜民族的自由解放。

朝鲜义勇队在刚成立时有队员140多人，编为一个总队。总队长金若山，副队长申岳。总队下辖两个支队，各支队之下再分成几个分队，我担任了二支队的二分队队长。第一支队基本上由朝鲜民族革命党的成员组成。支队长朴孝三，政治指导员石正。第二支队基本上由朝鲜青年前卫同盟组成，支队长李益星（中共党员），政治指导员金学武（中共党员）。后来在1939年，朝鲜民族战线联盟总部又抽调人员在重庆组建了第三支队，支队长是李苏民。“联盟”的另外两个组织即朝鲜民族解放同盟和朝鲜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只派出了极少的人员加入朝鲜义勇队。由于全队的大部分队员是青年知识分子。其中80%以上的人员又在国民党各种军校受过训练，虽然人数不多，但队伍精干，造成影响和活动能量都很大。朝鲜义勇队成立后的第13天，日寇就侵占了武汉。在这短短的时间里朝鲜义勇队担负了保卫大武汉的抗日宣传工作。我们用沥青和油漆在墙壁上、道路上用日文刷写了许多抗战标语，体现了人民不屈不挠、誓死赶走侵略者的战斗精神。日寇侵入武汉后，对这些醒目的标语大伤脑筋，为此不得不动用许多人力，用了三天时间进行涂洗。

在武汉沦陷的前三天，朝鲜义勇队撤出了武汉。根据当时的形势和工作需要，同盟总部迁到了延安。朝鲜义勇队的第一支队奔赴国民党第九战区。第二支队进入了第五战区和第一战区。第三支队组建后则活动在第六战区。朝鲜义勇队的主要任务是：一、对敌宣传，瓦解敌军；二、对中国军民进行抗日的鼓动宣传，动员广大军民积极参加抗战；三、争取众多的朝鲜同胞参加抗日，并扩充自己的武装力量；四、为提高队员们的政治觉悟，进行马列主义思想教育；五、参预或独立完成一些具体的战斗任务。

朝鲜义勇队的队员们充分利用自己既会朝文，又懂中文和日语的有利条件，进行火线对敌喊话，散发传单，张贴标语，以增大日军中的反战厌战情绪，进而瓦解敌人。在湖南通城，朝鲜义勇队穿过铁丝

网,进行火线喊话,反复向日军阐述“不要打中国兄弟,我们共同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的道理。结果促进几十名日军携枪投诚。在江西,朝鲜义勇队每天晚上用自制的铁皮喇叭向锦河北岸的日军喊话,使敌兵深受感染,不仅与朝鲜义勇队展开了对话,还订立了小规模停战协定,即使不得不开火时,也是枪往空中打,炮弹摘除了引信。在湖北乌龟山,朝鲜义勇队用亲手掩埋了在长岭战役中阵亡的150多具日军尸体的事实,谴责了日军长官遗弃尸体的行为,并委托能有幸返回家乡的日军士兵代表向死者的亲属告慰,日军士兵闻此十分感动。

我当时带领一个分队在洛阳,利用河南有线广播电台,用日语向日本人和用朝鲜语向朝鲜国内的人民进行反战和抗战宣传,并用铁的事实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侵略中国和亚洲时所犯下的罪行,号召人民团结起来,奋起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这场非正义战争。日本侵略者对我们的宣传惶恐万分,只好一方面在各地悬赏缉拿朝鲜义勇队的战士,贴出告示,声称一颗朝鲜义勇队队员的人头,可以换得五百元赏钱。但是朝鲜义勇队的英勇事迹却不胫而走。越传越远,不仅中国敌占区的朝鲜同胞秘密打听义勇队的消息,希望能加入这支英雄的队伍,就是在朝鲜国内,也流传着许多关于义勇队的神奇故事。

在对中国军民的宣传方面,朝鲜义勇队也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协助各战区司令部翻译日文、朝文文件,训练战工人员,仅在半年时间内,第一支队就为第九战区,第二支队为第五战区(以84军为中心),训练了50多名能用日语对敌喊话的官兵,在实际战斗中发挥了不少的作用。此外,朝鲜义勇队还在救亡工作中做出了许多出色的贡献,如参加救济重庆难民的工作。他们一面派人从桂林等地筹集资金,把物品送往重庆,一面出版了《救济渝市被炸难胞》报刊,并组成“国际义卖队”,将卖报的收入全部捐给了难民。我在洛阳还发起了由八个救亡团体和各界人士参加的“劳军团”,募捐以慰劳前线将士。

在争取朝鲜同胞参加抗日和壮大自己力量方面,朝鲜义勇队也取得了不少的成绩。日本帝国主义由于战线越拉越长,兵源严重不足,开始强迫朝鲜人入伍,为它充当炮灰。1939年日本政府颁布《陆

军特别志愿兵制度》，开始征收 30 岁以下的朝鲜男青年入伍。1942 年日本国会通过决议，对朝鲜人实行征兵制，每 2000 人中征抽 400 多名“义务兵”。这样一来，争取日军的朝鲜籍士兵工作越来越突出了。在朝鲜义勇队的广泛的宣传教育下，许多朝鲜籍士兵携枪投诚，再加上对朝鲜籍俘虏的审查和教育，要求参加义勇队的人更多了，队伍也日渐壮大。

1939 年，朝鲜义勇队第二支队正式建立了中共党支部，由新四军党委领导。中共党支部的建立，是朝鲜义勇队的成熟、发展的显著标志，它肯定和巩固了党对义勇队的领导，切实保证了义勇队与全体中国人民并肩抗战的政治基础，开辟了义勇队正确的发展道路。从此中共朝鲜义勇队党支部成为义勇队的政治核心的灵魂，教育和培养了大批立志献身于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朝鲜青年。它的历史意义怎样评价也不过分。

朝鲜义勇队虽然不是直接作战的主力队伍，但它的战斗身影却经常出现在各个激烈的战场。如湘北会战、鄂北会战、昆仑关争夺战、中条山反扫荡战，以及无数次中小战役。仅据 1939 年 5 月到 9 月的不完全记载：朝鲜义勇队就杀伤敌军 460 多人，击毁敌军车 121 辆。

日本帝国主义在其“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幻想破灭后，调整了它的侵华方针，采取了对国民党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法，将进攻的重点完全放在敌后的解放区。国民党政府在狼狈地撤到重庆后，也从片面抗战转为消极抗战，并以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为开端，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企图在抗战中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他进步力量。

身在国民党战场的朝鲜义勇队，认清了国民党消极抗日，真正反共的嘴脸，坚决要求脱离节节败退的国民党军队，要求去敌后解放区，去革命圣地延安。党中央根据形势的需要，于 1939 年下半年开始有计划地将朝鲜义勇队的各支队陆续调往解放区。1940 年到 1941 年秋，八路军总部安排义勇队经洛阳，北渡黄河进入太行山革命根据地。

具体的转移联络工作是由我负责的。除少数同志调到苏北、山

东、淮北的新四军部队工作外，朝鲜义勇队的全体人员分成四批，由我联系办理渡河手续，渡过黄河，经过中条山，到达了太行山革命根据地。后来我也接到了八路军总部让我离开洛阳去太行山革命根据地的指示，并让我设法从洛阳的八路军办事处带20名党的地下工作者去总部。我将这20个人（其中有杨公素、孙超等人）化装成朝鲜义勇队的队员，和他们一起到了太行山的八路军总部所在地。

朝鲜义勇队到达根据地后，首先受到了薄一波同志领导的“决死队”的远道欢迎。三八五旅还和义勇队举行了会师大会，陈锡联旅长致词，对我们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后来邓小平、彭德怀、刘伯承、罗瑞卿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我们。彭德怀同志热情鼓励我们要在艰苦的环境中边学习、边战斗、边工作、边锻炼和提高自己。

在1941年到1942年，朝鲜义勇队的主要任务集中在三个方面：一、在总部的领导下改组队伍，将名称改为“朝鲜义勇军”；二、开展武装宣传工作，并配合八路军作战；三、筹办军政学校，大批培养干部。

1942年7月，为了适应抗日战争形势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需要，“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和“朝鲜义勇队”，在太行山的漳河河畔进行了机构改组，将前者改名为“华北朝鲜独立同盟”（简称“独立同盟”），将后者改名为“华北朝鲜义勇军”（简称“朝鲜义勇军”）。在成立大会上还通过了《独立同盟纲领》，强调“本同盟以推翻日本帝国主义在朝鲜的统治，获得独立自由，建立朝鲜民主共和国为目的”，并提出了领导革命运动、建设革命武装，发展革命组织、扩大朝鲜民族反日统一战线，积极参加中国的抗日战争，支持世界反法西斯运动，保护朝鲜民族的利益等任务。大会选举金抖奉为委员长，崔昌益、韩斌为副委员长。我担任了秘书处的工作。华北朝鲜义勇军由武亭任司令员，朴一禹任政委，朴孝三任参谋长。彭德怀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和八路军到会，对独立同盟和朝鲜义勇军的成立表示祝贺，并在大会上提出了三点希望：一、坚持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二、发动群众、团结群众是胜利的保证；三、在实际斗争中培养革命干部。

经过这次机构改革，把解放区的朝鲜人都集中到了独立同盟和朝鲜义勇军的旗帜之下，并公开宣布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从此这

两个组织就成了华北 20 多万朝鲜人的革命中坚力量。

朝鲜义勇军成立之后，立即投入了抗日战斗。当时日寇为了占领解放区，在华北动用了它全部侵华兵力的一半，计 60 多万人，对解放区实行了残酷的“大扫荡”，妄图以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来吓倒解放区军民。为了粉碎敌人的“扫荡”，义勇军配合主力部队积极作战。在仙翁寨战斗中，不少朝鲜同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在邢台战斗中，担任掩护的义勇军战士宁可用最后一颗手榴弹与日寇同归于尽也不作俘虏。更为可歌可泣的是，当八路军总部被敌人包围后，义勇军主动承担了掩护总部撤退的任务，他们抢占了一个关键的制高点，阻击住了敌人，许多朝鲜同志和左权同志牺牲在一起。他们为了中朝人民共同的反帝解放事业，一起洒下了最后一滴鲜血。后来他们都同左权同志安葬在一起。朱德、叶剑英等同志多次撰文悼念牺牲的朝鲜同志，指出：朝鲜义勇军的奋不顾身、前仆后继、视死如归的精神，给日寇以巨大的打击，给八路军、新四军以有力的配合。朝鲜义勇军是反法西斯斗争中的一支新生力量，它对反法西斯斗争有着巨大的贡献。叶剑英同志 1944 年在延安所作的对中外记者团的报告中指出：“我军在抗战中光荣牺牲的烈士，不仅有中国人，还有国际的朋友。我们永远不会忘记那些为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也是为了朝鲜人民的反帝解放事业牺牲了的战友们。”

随着斗争的发展和胜利的取得，越来越多的朝鲜青年投奔了朝鲜义勇军。为了迅速提高他们的政治和军事素质，1942 年 12 月 1 日成立了“华北朝鲜青年革命军政学校”，由武亭任校长，郑律成任教育长。另外，在山东等地的解放区，也创办了一些类似“朝鲜革命军政学校”的学校，这些学校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为指导原则，选派毕业于中央党校或“抗大”的、有较多实践经验和较高理论水平的干部担任教员，在教学中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使学员的政治、军事水平提高很快。

1943 年到 1944 年这一段时间里，独立同盟和朝鲜义勇军在积极参加根据地建设的同时，仍主要进行团结、组织华北乃至全国的朝鲜人参加抗战的工作，和敌后开展反战宣传以瓦解敌军。

我最初受总部的委派，到豫北办事处作敌伪军的统战工作。通过有针对性的宣传教育，许多日军中的朝鲜籍士兵弃暗投明，加入了朝鲜义勇军，许多日本士兵加入了“日本人反战同盟”，当时还争取了华北地区安阳的一个日本宪兵队的朝鲜人翻译官，为我们提供秘密军事情报，购买军用物资。

后来独立同盟在全国各地设立一些分盟，我又被调到晋西北分盟担任主任，那里是通往延安的门户，我在那里负责审干工作，对去延安的朝鲜人进行审查和安排。我还参加了根据地的“整风运动”。我被选为晋西北边区政府的参议员，带领那里的朝鲜同志参加了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开荒地、办小工厂，以响应毛泽东同志“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

1945年初，为适应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即将胜利的形势需要，除个别同志外，朝鲜义勇军都集中到了延安，进入“朝鲜革命军政学校”学习，以整顿组织，整顿思想。在1945年2月5日，学校的开学典礼上，朱德同志到会讲了话。他勉励我们要学会怎样建立民族统一战线，要团结全体朝鲜人民，建立自己的武装，争取民族的独立解放。他还要求我们不但要学习军事，学习政治，还要学习经济和学习生产。林伯渠、徐特立、吴玉章等同志也先后讲了话。学校的学员们经常能聆听到党和军队领导的讲课。经常到学校来讲课的有朱德、刘伯承、罗荣桓等同志。他们主要宣讲国际形势，中国的抗战形势和东方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等全局性的问题，使学员们眼界大开，获益匪浅，我当时在学校继续负责对干部的审查工作。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政治报告中明确地指出：“我们认为开罗会议关于朝鲜独立的决定是正确的，中国人民应当帮助朝鲜人民获得解放。”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曙光已经出现了。

1945年上半年，日本帝国主义到了土崩瓦解的边缘。7月26日，中美英三国政府发表了《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8月8日苏联红军出兵东北。8月11日朱总司令发布受降及配合苏军作战的命令。其中第六号命令是命令在我国关内进行抗日斗争的朝鲜义勇军

与我八路军一同向东北进军，消灭敌伪，并组织在东北的朝鲜人解放朝鲜。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了。闻此喜讯，同延安全体抗日军民一样，朝鲜同志也都欣喜若狂，大家争相传阅日本投降的特大喜讯。当天晚上，我们彻夜未眠，尽情地高唱、欢跳，人人脸上流淌着激动的泪水，洋溢着兴奋的喜悦。我们遥望着东方，欢呼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侵占的祖国的独立和人民的自由解放。

为了迅速进军东北，朝鲜军政学校宣布停办，全体朝鲜义勇军和朝鲜独立同盟的人员随第一批“东北干部工作队”一起，从延安出发，直指东北。我当时担任朝鲜义勇军的秘书长，带领一部分同志打前站，给大部队解决吃住问题。我们一路扫清敌伪残余势力，一路开展政治宣传工作，还吸收了不少朝鲜同胞，使义勇军的队伍规模更大了。

到达东北地区后，朝鲜义勇军和独立同盟的领导机关设在沈阳城里，部队住在郊区的朝鲜族农村，准备进兵朝鲜。但是先期到达那里的苏联红军阻止我们，不让我们的队伍马上进入朝鲜。在这种形势下，朝鲜义勇军就分编为几个支队，分别开赴东北的各朝鲜族聚居区开展工作。其中第一支队到以长白山为中心的南满一带，第三支队由朱德海同志为首的20名干部开到了北满地区，其余支队全部进入了吉林地区的朝鲜族聚居区。我带着30多名干部到了延边地区，任朝鲜义勇军延边办事处主任。

1946年下半年朝鲜义勇军被编入东北民主联军。朝鲜义勇军部分人员编为若干朝鲜团、朝鲜营或朝鲜连，分别编入第156师、166师及其他各师。参加解放战争的朝鲜族战士大约有5万多人，立下了光辉业绩。